

图书出版编目 (CIP) 数据

找乐集/刘鹏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202-05976-0

I. ①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045 号

书 名 找乐集
著 者 刘 鹏
责任编辑 李 耘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省人民政府机关文印中心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29 000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5976-0/C·228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靜松聲遠
秋清泉響空

劉鵬鄉兄雅正
京東旭宇書

作者手稿一角

沉淀在脑海里和记在本上大量的
观点材料，像多种多样珍珠
般的贵重零件。写作就是用灵
感的红线，把它们一颗颗串起
来，组装成：或是美丽的项链、
手镯和头饰品，或是能照亮夜
路的手提灯，或是能解开心结
的钥匙，或是能战胜强敌的武
器，或是何时需用便可信手拈
来的智囊，等之。当看到这些
宝贝从自己手中诞生，又得到
社会和读者的认可，便乐趣横
生。这真是最好的精神享受。

自序

我充其量只有个中专学历（20世纪80年代才补学了中文大专），粗通文字，写作起点无疑是很低的。好在我平生没有任何嗜好，只喜欢爬格子，写点儿小文章。本书所收入的就是从我二十岁以来的50多年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300多篇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共计85篇。写作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把这个文集命名为《找乐集》，可谓是顺其自然的了。

一、关于“找乐”

在学校当学生时，我写的作文是比较好的，有时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参加工作后，曾先后给报社写了许多篇稿子，均未被采用。但是，我没有灰心，仍坚持屡退屡写。1957年上半年的一天，我陪着母亲、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天仙配》，当影片放映到尾声“明年春暖花开日……”时，前排不少人站起来往外走，而且还吵吵嚷嚷，挡住了母亲的视线，扰乱了听觉。电影结束后，我们出了电影院，母亲遗憾地说：“挺好看的电影，没看上结尾。”晚上，我就把当天看电影遇到的这件事，以《请再忍耐三五分钟》为题，写了一篇约300字的小文章，寄到了《张家口日报》。第三天，文章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是我写的东西第一次排成铅字后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面世。报纸寄到我的手里，我惊喜，全家人都异常高兴，我住的12平方米的小屋里沸腾了。午饭母亲包了饺子，庆祝胜利。高兴之后，我把这篇小文章和以往的几篇退稿，从主题、内容和写法上加以对比，找出了这篇稿子之所以被报社采用的原因：一是文章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是多数人关心的一个实际问题；二是立意比较新颖，就实论虚，有一定说服力；三是文章短小，一口气就能看完。而我过去写的稿件却很缺乏这样的优点，报社退稿是有道理的。从这篇小小的处女作中，我似乎摸到了给报纸写稿的一点“窍门”。

第二年，即1958年夏天，“大跃进”开始了，张家口市同全国一样，大搞

全民炼铁。我所在的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派我参加炼铁，一直干到1959年5月，前后有10个多月。炼铁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在工地干8个小时，加上上下班往返路途需两个多小时，全天劳作10多个小时。这种笨重劳动既枯燥又很消耗体力，一般人回到家除做饭吃饭就是睡觉，恢复体力。而我却在这个忙碌劳累的日子里找到了乐趣。在工地上，留心观察人们的心态举止，在往返的路途上感受社会的气氛，回到家里把沉淀在脑子里的东西及时记录下来，在看书看报时不断地加以联想，搞得思想异常活跃，隔三岔五地就冒出一个写作的灵感，经过几天酝酿，写成散文或小小说在报纸上发表。比如，有一次我夜里下班回家的路上扎了自行车后胎，街上修车的早已收了摊，我只好推着车走回机关，打算第二天再补车胎。没想到，当我第二天推车时，车胎已补好，充满了气。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是机关的一位锅炉工陈师傅夜里给我修好的。我十分感动，下班后，就以这件事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修车》的800字的小散文，几天后登在《张家口日报》上。文章发表后，在机关引起很大反响，机关党委还在一次会上表扬陈师傅背后帮人做好事是共产主义风格，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类似这样的散文、小小说的作品，我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写出一篇寄给《张家口日报》，几乎没有废品，每篇都能很快发表，前后共发表了20多篇。这10个多月，由于我上班炼铁劳动，下班读书写作，每天都有一股强大的活力在驱动着我前进，有一种新的灵感在我的内心激奋飞腾。炼铁劳动是枯燥的，我却乐趣横生；炼铁劳动是单调的，我却感到它多姿多彩；炼铁劳动是劳累的，我却感到愉快轻松；10个多月的工地生活是漫长的，我却感到时光过得太快，炼铁劳动成了我练笔的一个绝好机会。当单位领导让我结束炼铁劳动，回机关工作时，我对那个工地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单位领导在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口头表扬我在劳动中写了那么多好文章在报上发表。

我写杂文和思想评论发表的园地，从地区报——《张家口日报》提升到省报——《河北日报》，实现这个跨越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写作技巧上的进步以外，主要是因为我在思维方式上能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转换和更新。我从炼铁工地回到机关不久，我国便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个时期，机关工作人员用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在农村参加劳动或下乡蹲

点，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机关工作。而我还达不到这个比例，在下边的时间更多些，所以我对当时人民群众承受的疾苦直接地看在眼里、扎在心里。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期间，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理论研究和宣传。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在思考问题和写作上做了两点调整：一是改变写作文体。为了使我的业余写作与本职工作相衔接，我下决心改掉了初步形成的写散文和小小说的习惯，试着写说理性的杂文和思想评论；二是以积极的态度和新的视角观察眼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总的说是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同党一条心，共渡难关。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在观察思考事物的角度上尽力超越低层面，追求高境界，借鉴古人“举一反三”的辩证思维方法，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思维方法上做到：遇暗思明，遇错思正，遇低思高，遇苦思乐，遇丑思美，遇假思真，遇邪思善，遇散思齐，遇难思易，等等，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多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我们党优良的思想、道德和作风。这样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党中央所倡导的，但在干部、群众中是迫切需要普及、渗透和发扬的。我按照这个视角写了几篇杂文和思想评论，果然得到了《河北日报》编者们的认可，并予以采用。从此我便沿着这个思路撰写下去。

我下乡劳动或蹲点，每次背着的行李都比同去的同志的行李要大要重，因为里面除了穿的和用的物件以外，还有许多书。在农村，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后，别人睡觉休息了，我必须在一早一晚和中午看两三个小时的书，并联想当天耳闻目睹的事情，加以思考，写成笔记。现实生动的材料和思想中的火花积累多了，说不定在哪一天头脑里迸出一个新颖的又有意义的文题，在灯前月下一挥而就，写成一篇短文。有时在回机关或到其他村庄办事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已经胸有成竹了，就在树阴下，背包当凳子，两条腿作桌子，一口气写了出来。蹲在机关，晚上加班就方便多了，一千字上下的杂文，大多是一个夜晚完成，第二天早上寄出。沉淀在脑海里和记在本上大量的观点材料，像多种多样珍珠般的贵重零件。写作就是用灵感的红线，把它们一颗颗串起来，组装成：或是美丽的项链、手镯和头饰品，或是能照亮夜路的手提灯，或是能解开心结的钥匙，或是能战胜强敌的武器，或是何时需用便可信手拈来的智囊，

等等。当看到这些宝贝从自己手中诞生，又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便乐趣横生。这真是最好的精神享受。1959年至1964年上半年，仅在《河北日报》上我就发表了50余篇杂文和思想评论，加上在张家口地方报刊发表的，差不多每一周就撰写出并发表一篇作品，而且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业余读书写作伴我度过了那个困难艰苦的年代。那时，我的物质财富是贫乏的，精神财富却是很丰富的；身体是疲劳的，精力却是旺盛的；肚子常常是空瘪的，内心始终是充实的；走进饭堂因定量不足而感到沉闷，翻开报纸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在上面却觉得其乐融融。这些作品我均一篇篇珍藏起来。想不到的是，在我打算编这部文集想使用它们时，却发现不知啥时候丢失了，只好到省、市图书馆去查阅、复印。这件工作对我这个年逾七旬的人来说是个苦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些装订成册的一叠叠发黄发黑的旧报纸上登着我写的文章时，如同见到阔别的亲人，它在我眼前闪光、微笑，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乐趣。

1982年5月，我步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大门。从此，我从主要同机关行政人员打交道，转为主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所遭受的不幸和饱尝的苦辣生活，以及在他们被平反后不计前嫌，仍以饱满的热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分配给他们的那份工作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大大净化了我的灵魂。我暗暗下了决心，我要用组织分配给我的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河北学刊》这个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为这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为他们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版面。白天忙于编务编辑工作，晚上翻阅有关办好期刊的书籍资料，浏览兄弟刊物，和同仁畅谈、议论，思考着如何贴近河北的实际，把自己的刊物办好、办活、办出特色，探讨办刊的一般规律性和我省这个期刊的特殊规律性。经过五六年潜心专注的探索，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在全国较为著名的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一批有关期刊特色、期刊管理和期刊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论文，在省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我深深地体会到多姿多彩的科学研究的滋味。在《河北学刊》任总编8年的工作和研究生涯，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 and 业务的基础，接着在省社科院主办的《经济论坛》杂志社任社长的5年和连任两届河北省社科类期刊学会副会长，以及退休后的几年，期刊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质量也更高些了，还先后撰写了一批

有关经济和企业的论文，这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繁衍发展的。回顾这十几年的期刊工作，我最大的精神享受，不只是技术职务由副高职升为正高职的时候，而且是在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找到办刊的一个一个的真谛和表述这些真谛的一篇篇论文发表后受到行家、同仁的肯定和鼓励的时候。

二、关于这个“集”

关于此“集”的细节，我已在三个部分的“题记”中做了具体的交代，这里只回顾有关这个“集”的一些背景材料。如前所述，业余写作的乐趣，使我在笨重、大劳动量的大炼钢铁中感到轻松愉快，在艰难困苦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感到幸福充实，在工作岗位转换时没感到失落，反而觉得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可以想象得出，假如没有这个业余写作的兴趣和才能，这三道难关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过法，也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归宿。在我进入老年，能将自己一生的文稿，选编成这个“集”，我的感触颇多，最集中的就是党的培养和教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前途，根本谈不上这个业余爱好。从大的环境上说，党给我提供了顺利成长的沃土、雨露和阳光。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具体的，许多共产党人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了有益的帮助。就写作而言，在我走上业余写作这条路之后，难免遇到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可是一到“节骨眼”上，总会得到共产党人的帮助，有些人在背后支持了我，而我至今尚不知晓；有些人则直接走近我的身旁，助我一臂之力，帮我继续向前奔走。

当我业余写作的能力像一株刚出土的幼苗那样稚嫩时，就有一位“保护神”保护我，他就是张惠生。张惠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张家口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我是他的部下。个别人对我在报纸和刊物上经常登载文章似有微词，张惠生部长知道后，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走进我的宿舍，同我交谈。他说：“你是咱宣传部最勤奋的，写东西最多的，不要在乎别人说长道短，要坚持写下去，坚持十年八年，就可以印成一本书。你看远千里（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战争时期爱写短诗，有的人也不以为然，可他坚持写，现在收集起来，不是出版了一本《三唱集》吗？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嘛！”张惠生部长平时很严肃，少言寡语，那天却是侃侃而谈，有说有笑。他的这番语重

心长、见解不凡的话语，保护了我业余写作的积极性，给了我力量和希望。

当我这株幼苗茁壮成长，将近“三十而立”时，有一位识才的“伯乐”发现了我，他就是翟向东。翟向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河北日报》总编辑，他的同事和下级都不称呼他的职务，而亲切地称他为翟同志。在1959年到1964年间，《河北日报》副刊版先后登了我一批杂文，引起翟同志的关注。他觉得，这些稿件思想有深度，文笔流畅，来稿和被采用的数量较多，能长期坚持写，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政治思想成熟、知识丰富、写作能力强的老干部。他拿不准，便派编辑或记者到张家口了解。文艺部刘锐、副刊部王峰曾先后到我的宿舍交谈，他们鼓励我多写、再多写。他们回报社后反映，那个作者是一个不到30岁的身体干瘦却很精神的小伙子，这便引起翟同志的重视和兴趣。1963年秋，翟同志趁张惠生部长到省委开会的机会向他提出调我到《河北日报》工作的意向，张难以割爱。1964年上半年，省委一位书记签发了调令，张部长觉得“卡”不住了，才允许我到省里报到。到省后，已兼任新成立的中共河北省政治研究室主任的翟向东把我留在这个研究室工作，他第一次见到我就热情鼓励说：“你的杂文越写越好看，越写越成熟了。”这些话，当时对我真可谓一字千金，给我的内心注入了巨大的力量。在“四清”期间，翟向东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接着组织上明确我做翟的秘书。在基层我除了搞实际工作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同他一起搞资料，总结经验，写报告。经多次接触后，我发现，他博学多才，文风严谨，对工作极其负责，一丝不苟，这使我受到深刻的教益。“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翟同志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我曾因事同他通了几次书信，每次他都及时地给我回信。信纸上那书写工整的字迹，热情的语言，凝练的文字和所表达的精湛的思想，令我爱不释手。我与翟同志原本素不相识，他没有得到我一丝一毫的好处，他只是从稿件中发现了，接着又培养了我。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大公无私、唯才是举的高尚情操。认真地说，没有翟向东这位“伯乐”，我的人生里程难以走入新的一站，我的写作水平和作品数量难以提升到今天的境界，更谈不上有这个“集”了。

当我人到中年，失去一个单位的工作职务时，接着又有一位良师向我伸出

热情的双手，给了我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省社科院主办的《河北学刊》杂志社的编辑管理工作。他就是石虹。石虹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是河北省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了解我的历史的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和该院的一位副院长向我介绍我“文革”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有一定写作能力。就听了这么一个简要介绍，可能又加上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的旧印象，石虹很快接纳和信任了我。他接连两次委托我为《河北学刊》起草关于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评论员文章，两次我都圆满地完成任务，没有让他失望。从此，他对我更加器重，多次找我共同讨论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事业的大事，让我帮助他起草或修改一些重要的文件稿。对我提出的建议，他都认真倾听，有采纳价值的，他就加以采纳。过了几年，年事已高的石虹院长离休了，但他在任职时给我注入的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感、责任感，越来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以往我对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原本就是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的。由于石院长的指引，我欣喜地发现，期刊编辑工作，是世上“三百六十行”的社会职业中很适合我从事的一个行当。我很快爱上了这项工作，千方百计地干好它，专心致志地研究它，把我前半生经历中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人际关系等一切可用的东西，全部用上了。石院长离休后的一天，院人事处的负责人对我说：“组织上考虑到你原来的职务，打算调你到别的厅局工作，你考虑一下。”我没多加考虑，当即回答说：“谢谢组织上关心。我既然来到社科院，就决心在社科院落地生根开花。不想再变动了。”我就像一颗螺丝钉，死死地拧在社科院这个“机器”上。因此不仅期刊事业有所成就，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和公开发表了本集收入的有关期刊探索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系列的论文。

当我年逾60岁即将退休时，有一位挚友诚恳地邀请我做他的理论顾问，帮助他研究企业文化，创办《企业文化导刊》。这样，在我的论文中便增添了有关企业文化研究的新篇章。他就是陈世增。陈世增是唐山豪门集团公司总裁。以啤酒业为主体的豪门集团公司坐落在我的家乡玉田县。创建初期我和陈世增没有见过面。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我在《河北学刊》时他来石家庄同我见面交谈。他说他年轻时在中共遵化县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文革”期间不幸蒙冤入狱，平反后志愿创办玉田啤酒厂。他爱好和擅长理论写作，写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论文。我也简要地讲了我本人和《河北学刊》的一些情况。我俩越谈越投机，互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到《经济论坛》任职后，我俩来往逐渐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久而久之，成了挚友。在《经济论坛》起步艰难时，他慷慨地予以资助，使这个刊物得以很快发展起来。他撰写出版的《厂长的哲学》和所作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多次讲演所阐述的独到的见解、深邃的哲理和掷地有声的语言，使我为之倾倒，促使我动笔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有关他本人和豪门企业文化建设的文章；同时，受他的委托，主编了内部出版发行的《企业文化导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有一句名言：“朋友就是知心人，真正的朋友之间不能搞等价交换。”但我仍觉得他给予我的甚多，而我回报他的甚少，心里不平衡，也不平静。

三、关于“乐”后又怎样了

最重要的是对党的信念的增强和综合写作能力的提高，这是我事先未曾料到的。一个人的正当爱好，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而且久而久之，这种爱好会自然而然地升华为一种特长。爱好属于情感的范畴，而特长则是对社会有用的能力。人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先苦而后甜，苦后而成才。这样说自有它的道理。我的经历则不同，我是“乐”而后成才。在青年时代，我对业余写作如醉如痴地追求，扎扎实实地实践，在不知不觉之中，提高了我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的素质，连自己也没想到，它竟然在本职工作中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由于业余写作的需要，我平时读的书籍报刊比较多，对现实问题勤于思考和探求，因此对领导分配给我的文件材料起草等工作任务，也就想得比较深广，善于把握重点，立意恰当，构思合理，起草出的文件材料，有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用词准确，文笔流畅，而且均能提前完成任务。在中共张家口地、市委宣传部工作时，我受领导委托，编写了《〈实践论〉学习辅导材料》，约两万字，以宣传部名义印发给干部学习参考；为地委书记起草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稿；代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撰写《满腔热情地选拔培养青年干部》约5000字的论文；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代宣传部撰写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长达7000字的论

文，均在《张家口日报》上原文登载。1960年，代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的约5000字的宣传材料，印发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地委书记的口头表扬，并要求宣传部的干部们学习这种有针对性、说服力强、重点突出、文字简洁的写法和明快活泼的文风。

“十年动乱”的第三年，即1969年初，我被调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后改为省委办公厅）任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后为省委常委）会议秘书，任务是编排会议议题，会议内容、时间确定后发会议通知，会上做会议记录，会后整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批后送印刷厂排字，经校对无误后印发给有关人员和部门。据我所知，在摇笔杆子的人群当中，有的人擅长于给公开出版部门撰写各种文体的文章，却不善于给党政机关起草公文；有的人擅长于给党政机关起草公文，却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什么东西；有的人则这两个擅长都具备，我可能靠点这一类，而且由于工作岗位的转换，我先由前者进入后者，继而又由后者转回到了前者。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后任省委副秘书长）的蔡音主要负责省革委（后省委）文件的起草工作，但他不能列席党的核心小组（后为省委常委）会议。由于我具有一定的写作基本功，在做核心小组会议记录时，对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内容，能较准确地理解和整理归纳，对他起草文件工作很有帮助，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文件起草工作的帮手，有些文件他还放手让我独立完成起草任务。这样，除了原来的只有我一人（后又增添到三人）操办的会务工作以外，又增加了参与对省委文件的起草工作。我除了吃饭和必需的睡眠时间以外，其余的时间全部被工作占用了，加上动乱年代，看准的问题不能写，能写的问题又看不准，因此这一时期，我的业余写作成了个空白。我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官方文牍上，同时对领导工作中不够妥当或欠周全之处考虑得比较多，敢于以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其中有些获得领导的肯定和采纳，从而受到党组织的重用，1975年初担任主抓全面工作的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的我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省革委副秘书长。

1977年初，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力调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经马力提名，调我随他同去，任中共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候补委员，在当时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主要是从省委的文字工作上助他一臂之力。我到任后，不仅按时完成了平时和应急的省委文字工作，而且协助马力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发表了两篇理论文章，其中贵州省委向中央呈送的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肯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各地参阅。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后，全省形势已经稳定，省委和各级党委恢复了领导工作的权威，全省工作有了起色，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经个人请求，省委批准，于1979年初，我返回了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仍任原职。临别时，马力以“青野”的署名赠诗给我。诗的全文如下：

送战友

青鹏远飞落苗峰，战友相随喜筑城。
焕发精神忙筹划，石砚金锋写歌声。
两年相助心相印，玉樽送别情更深。
勤奋读书共勉励，冀黔天涯若比邻。

青 野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七日于黔州

1979年至1982年上半年，正值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分管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我和省信访部门的干部一起，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协调省直有关部门快速认真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协助有关部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使我省赴京上访人数大幅度下降，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信访部门负责人的表扬。我全面、系统总结廊坊地区信访工作经验的文章，省委转发到各地参考，党中央、国务院信访工作的内部刊物作了转载。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后，继续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在任《河北学刊》总编和《经济论坛》社长期间，与编辑部的同仁们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先后办好办活了《河北学刊》和《经济论坛》，使这两个刊物多次被评为河北省社科类“十佳期刊”。

我还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我退休后，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过着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幸福的退休生活。省社科院领导集体颇富创新和开拓精神，不断开创我院发展的新局面。他们对自建院以来在这里辛勤工作一二十年后离退休的老干

部、老科研人员的工作科研业绩，予以很高的评价，并给一些人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余热，我也是其中一个，使退休后的日子更加丰富多彩。在我院举办的一次歌咏大会上，我上台唱了一首题为《我爱你，社会科学院》的颂歌，歌词是我作的，反映了我的心声。

在燕赵大地上，有一处在发光，
这就是社科院，科学殿堂。
人才济济，决策智囊，
求是创新，成就辉煌。
我爱你，社科院，
我们的家，科学殿堂。

在燕赵大地上，有一处在发光，
这就是社科院，科学殿堂。
蒸蒸日上，和睦吉祥，
老人受尊重，青年似朝阳。
我爱你，社科院，
我们的家，科学殿堂。

2010年11月20日



本书作者（右）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共张家口地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去涿鹿县下乡蹲点次数较多，故同县委宣传部干事程兆海（左）结为挚友。他后来曾任中共涿鹿县委书记、张家口地区农业局局长。

思想道德篇

[题记] 这部分选入短文 47 篇，其中 40 篇是我 1957 年至 1964 年在青年时期的习作，6 篇是中年时期的作品。其中 16 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27 篇刊登在《河北日报》，1 篇刊登在《人民日报》，2 篇刊登在《红旗》杂志。青年时代写的短文有些难免文笔稚嫩，有的瑕瑜不掩，够不上完美之作。有幸的是，这批短文的内容宣扬了中华民族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及我们党的优良思想、道德和作风，与当今宣传贯彻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还是合拍的。40 年前写的这些粗糙文字，今天还有如此小用，令我惭愧之中亦有欣慰。本篇首荐篇目：《有感于“老孙受屈”》（第 62 页）、《少用“替手”好》（第 98 页）和《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究适度原则》（第 103 页）等。